

2017 中国慈展会版社企认证标准出炉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在公益慈善圈引发诸多讨论。前不久,因摩拜是否属于社会企业引发广泛争议。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正在找寻下一个风口,社会企业或许会是一个方向。

2017年6月21日下午,“国际视野下的社会企业暨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发布会”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国创中心校区举行。经过前两届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工作的实践与探索,结合近几年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在借鉴国内外社会企业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2017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工作在认证标准制定、认证程序、认证后续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本次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的发起机构和执行机构较前两届认证工作也有较大调整。

国外社会企业数量庞大

2017年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发布会也是继6月11日发布《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之后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落地行动,将通过社会企业认证,迈出营造中国社会企业生态体系的第一步。后续通过专业化与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吸引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等公益金融资源,从而完善中国社会企业乃至公益金融领域的生态系统建设。

社会企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中已经运作了近30年,到2015年英国已有7万家社会企业(数据来自《2015年度英国社会企业调查报告》),

西班牙有超过5万家(数据来自西班牙社会经济企业联合会),2015年苏格兰已有超过5000家社会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企业不仅能够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可以引领更多跨部门和跨领域的资源流动。因而,社会企业也成为了社会创新的表率 and 公益领域的重要生力军。

22个国家具备认证体系

目前,国际上已有22个国家具备较完整的社企认证体系,部分欧洲北美国家则有多个认证模式,如英国有社区利益公司(CIC)的政府认证模式、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EUK)和SE Mark的社会企业认证模式,美国有低利润有限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3C)、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等的政府认证模式,及B Corps的社会认证模式,东亚的韩国及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实践多年的认证体系。

国际上的社会企业认证实践表明,社会企业认证是建构整个社会企业生态体系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如此多的认证种类,哪种更多合适呢?

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分论坛——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似乎给出了一些答案。

“我反对一个标准,可以有多个标准竞争,看谁愿意走哪个标准去接受认证。”南都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掷地有声地说道。

徐永光的的态度得到了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的赞同,他认为政府、大学、行业都可以出标准。

“第三方评判应该是多元的。中国那么大,各地差异性也很大,所面临的问题均不一样,认证不可能一刀切。”顾远表示。

顾远觉得,在中国很多人愿意去获得社会企业这一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不同的资源。但国外的社会企业更多是自我的价值声张、自我的身份认同,更像是一种自我约束。如果你也认同,欢迎加入,让我们变成一个社群。

申请认证机构数量持续增长

目前,中国社会企业认证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2015年9月中国慈展会发起了首个全国性社会企业认证。

2015、2016年两年的认证过

程中,总共收到221家机构的申请(2015年67家机构申请,2016年154家机构申请认证),最终85家机构进入最终的专家评审环节(2015年39家机构入围进入评审会,2016年46家机构入围)。

经过两届的认证,总共有23家机构获得认证(2015年有7家机构获得认证,2016年有16家机构通过认证)。

第二届认证首次采用分级认证的方式,中和农信是第二届认证中唯一获得金牌社企的社会企业。这一年,深圳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南都基金会共同发起了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工作。

2017年,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共有7家发起机构,除了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会4家机构是前两届认证的发起机构外,本次认证还新加入

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亿方公益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三家机构。

本次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的执行机构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和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分红和收入结构来源不再作为认证要求

在2016年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基础上,本次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是对社会组织和企业两类申请机构,采取不同的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从而使认证标准和认证流程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加专业化。

二是将从整体上降低认证门槛,取消以往对申请机构的分红限制和收入结构来源的限制,而是将分红规定作为加分项处理。

三是对公司治理的规定增加了“治理结构有社会目标优先的机制性设计”的相关规定,以此来确保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优先。

四是增加了“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清晰可测量”的认证标准,更加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成效。

五是在后续服务支持方面提供能力提升、网络链接、资源对接、品牌建设等更加专业化和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

六是取消了以往认证最后评审专家投票表决环节,而是根据申请机构的分数是否达到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的不同级别的认证标准来直接判定,如果申请机构对申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评审委员会重新审核。

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6月21日,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联合国妇女署官员马雷军表示,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公益项目才更有效。

女性声音需要被听到

某国际援助项目在天津蓟县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一个村子中间穿过。路修好后做评估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村子里90%的男性觉得这条路很好,但一半的女性表示不满。因为路的另一边是菜市场和学校,买菜和接送孩子都是妇女的事。原来只需要两分钟的路程,现在来回要绕两三公里。男性一般骑摩托车出门很方便,女性则更麻烦些。后来当地按要求整改,修了一座天桥。

如果在公路设计的时候,就听取女性的观点和意见,项目设计会更加合理。但是在项目开展之前的评估,也非常少有女性参与。所以,马雷军表示,不只是单纯的性别类慈善项目,所有主流

化项目中,都应该加入性别观点。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最大化。

在对汶川灾区回访时,马雷军问一位妇女,对救灾物资是否满意,得到的回答是“也满意也不满意”。说满意吧,总给发东西;说不满意吧,需要的东西总没有。村长已经通知她去领第四个皮夹克了,但她需要的是卫生巾。

不只是生殖健康

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海瑟·格雷迪,对美国和中国慈善领域同样了解。她统计了美国基金会关注的性别议题,发现2010~2015年,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相关项目大部分是支持生育健康,其次是妇女的教育。主要是关注她们在生育方面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其他方面。

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是多方面的:包括针对妇女的制度性歧视;

针对妇女的暴力;损害妇女、女童权益的行为,严重的如童婚、割礼,轻微如刻板印象等;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妇女在各类决策中的参与能力;性与生殖健康;非正规就业。

“同时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污名化使得受到暴力的女性没有办法站出来发声。中国也是如此。”海瑟·格雷迪说,“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现在妇女占劳动力的大部分,但在决策上却没有权利。生殖健康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应该关注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根源。这方面甚至应该投入更多,因为转变社会机制更困难。”

“如果我们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捐助捐赠可能会达不到目的。”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伯红强调。

怎样在慈善项目中加入性别意识

马雷军讲到乐施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女性来参加,可以领到餐票,省去照顾家人吃饭的担

忧;如果女性参加培训,男性在家做饭,则可以领到奖励。这样的措施确保了女性参与度。

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则讲述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姚基金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育,组织学生篮球队。中小学生在打篮球通常是男生的游戏,但项目要求,女生的比例不能低于20%。为了增加女生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在篮球赛季比赛规则中规定:女生正常投入一个球得3分,男生仍然是2分。通常学校为了达到要求,是4个男生带1个女生,有一个学校队伍利用这个规则,4个女生和1个男生组队,4场小组赛赢了3场,这让女生们也很自豪。

这个项目告诉我们,一个支持性的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组织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心智障碍者家庭中,很多家长开始发起成立公益机构,自救同时也救助同样遭遇者。“我们发现这几千家家长自救型组织中,发起者大部分是女性,都是母亲。”南都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徐永光说,“我们支持了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联盟,这个领域的发展,可以让更多女性得到解放。”

性别平等对男性有益

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就通过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但限制仍然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女性是完整的主体。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蒂姆·德美尔从男性视角解读性别问题。他表示,男性通常会倾向于把经济行为看成零和游戏,一方赢必有一方输。但是性别问题不同,通过提升妇女的薪资水平,可以看到新的经济驱动力。

“怎样让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长期来看对男性是有益的,这非常重要。”蒂姆·德美尔说。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就业方面女性参与程度也很高。但也存在问题,目前各个层面都认识到市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则可能伤害到一些人。